

明清两代对孔府的“优渥”事例

林 永 匡

山东曲阜孔氏贵族地主，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从明清到近代，由于封建统治者的特殊恩宠和“优渥”，致使孔府在全国不仅具有显赫的政治地位，而且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从而成为明清两代全国首屈一指的“安富尊荣公府第”和“文章道德圣人家”。本文从《孔府档案》中，关于孔府优复恩例类的一些未编号档案资料，和《国朝恩典节略》等的有关记载，进行这方面的论述。

崇儒尊孔，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巩固和强化统治秩序的手段。明太祖洪武元十一月，明王朝即将衍圣公官秩，由原来的三品升为二品，阶资善大夫；永乐二十二年，明王朝又赐衍圣公孔彦缙正一品服，麟袍玉带，三台银印一颗，朝贺列文武班首。天启四年（公元一六二四年）时，又加“以覃恩加太子太保”。到明末崇祯元年（公元一六二八年）时，更“加太子太傅”衔^①。

据《阙里志》卷十二载，明王朝统治者还诏定衍圣公属官若干员，其中有管勾一员，典籍一员、司乐一员、尼山书院、洙泗书院山长各一员，（明正德二年时又将此山长职衔改为学录，分别在这些书院“以主其祀”）三氏学教授一员、学录一员，还设有掌书一员、知印一名、书写一名，从衍圣公保举堪用人数，移咨吏部除授。为了祭孔的需要，还设有博士两名。

为了保障每年祭孔的经济上耗费和孔氏贵族地主反动政治寄生性消费的支出，自明太祖朱元璋起，赐给孔氏贵族地主大量的祀田拨给大量贫苦农民充作孔府佃户人，供其剥削役使。首先，自明朝初年起，明王朝便全部优免了孔氏子孙的杂泛差徭。以后又陆续蠲免了衍圣公本户和族人自置田土的税粮，称为免粮地。到明万历年间时，在曲阜、邹、滕三县又有轻粮地，所征正杂银数都比常赋特轻。其次，在赐田方面，明洪武二年（公元一三六九年），明太祖朱元璋“钦赐祭田二千大顷，坐落兖属二十七处”（一大顷合三百市亩）^②。这些祭田拨给佃户承种，以其收入供给庙庭祭祀、属官俸禄、各役工食，以及孔府自己支销之用。永乐五年（公元一四〇七年），明王朝又拨赐给孔府贍田四段，共七十三大顷。其三，在明代，孔府的佃户、佃户户人，亦是钦赐拨给。朱元璋于洪武二年“钦拨民间”五百户，“凑人二千丁”。每年地租收入，供孔庙“祭祀等项支用”^③同年，朱元璋还“钦拨民间”“一百一十五户以供本庙洒扫”，强逼无依农民充任^④。世代为孔府服役。

到了清代，孔府与清王朝中央政府的关系，较之明代更为密切。清初统治者为了迅速地确立全国的封建统治秩序，需要标榜“尊儒崇道”，以减少汉族士大夫和地主的阻

力，故对孔府予以种种“优渥”和殊荣。而孔氏贵族地主为着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的利益，亦加紧投靠新王朝主子。恰是这种各自对对方的需要，构成了有清一代中，孔府与清王朝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特殊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顺治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山东巡抚方大猷向清王朝呈递了《恭陈平定山东十二要策》的重要奏折，其中就谈到孔孟之道及对圣裔大宗的优礼问题，他在此奏中说：“先圣孔子为万世道统之宗，本朝开国之初，一代纲常培植于此，礼应敕官崇祀，复衍圣公并四氏学博士等之封，可卜国脉灵长，人文蔚起……”他还特别强调指出：“此天下仰以为盛典，后世传之以为美治，万不可迟缓也。”对此奏，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予以格外的重视，并采纳了他的这些建议。据档案《国朝恩典节略》记载：同年，衍圣公孔衍植“驰驿入觐，遣官迎于邸第，给天字第一号下埤陛见，班列阁臣上。”并传旨：“孔衍植仍以太子太傅袭封衍圣公”⑥。

顺治二年（公元一六四五年），清王朝又传圣旨：“加称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并“赐衍圣公三台银印”一颗⑦。

顺治四年（公元一六四七年），衍圣公孔衍植卒，顺治帝不仅“遣官喻祭九次”，而且还“谕工部给价造坟”。

顺治五年（一六四八年），顺治帝和清政府又“敕孔兴燮袭封衍圣公”。

顺治七年（一六五〇年），清王朝又“进衍圣公孔兴燮太子少保”。

顺治八年（一六五一），顺治帝还“进衍圣公孔兴燮太子太保”。同时，“准衍圣公孔兴燮奏国子监学正世袭，以奉仪封县圣庙祀”。

顺治九年（一六五二年），顺治帝更亲自祭孔，“幸学释奠，行三献、两跪、六叩头礼”。在此之前，曾“先期遣行人召取衍圣公孔兴燮及五经博士并族人，赴京观礼，”礼毕后，“御彝伦堂赐坐”。“赐宴於礼部”，又赐衍圣公蟒缎朝服、貂帽。五经博士子孙及监生，赏给品服、银两。”更下“诏陪祀生员俱准作恩贡送监读书。”

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清政府又“诰授衍圣公孔兴燮光禄大夫”。

顺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年），清王朝政府则“颁衍圣公清、汉文三台银印”。

康熙时期，清王朝统治者为了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巩固其封建统治，因而更行尊孔崇儒的政策。《国朝恩典节略》这一档案中，亦有详尽的记述。

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年），“衍圣公孔兴燮卒”，康熙帝“赐祭葬”⑧。

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年），康熙帝又“敕孔毓圻承袭衍圣公”。

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康熙帝又在京“幸学释奠”，并“先期遣行人召取衍圣公孔毓圻率各博士、族人等赴京陪祀”祭孔仪式。予以殊荣。

康熙九年（一六七〇年），康熙帝及清王朝政府“授衍圣公孔毓圻光禄大夫”。

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年），康熙帝和清政府又“进衍圣公孔毓圻太子少师”。

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康熙帝在第一次南巡回銮途中，专程去曲阜参拜孔庙及祭孔）同时，康熙帝还亲手“御书《万世师表》四字，悬大成殿。特留曲柄黄盖。诣孔林酌酒，特命扩孔林地十一顷零，除其租赋。”此行中，康熙帝还“赐衍圣公、五经博士及族人等书籍、貂蟒银币”等。

康熙二十八（一六八九年），康熙帝恩准孔毓圻关于重修孔庙的折奏。“命皂保同工

部虞衡司郎中阿尔稗，重修阙里孔子庙殿庑门坊二百六间，用帑银八万六千五百有奇。”并“赐衍圣公孔毓圻《诗书礼乐》匾额”。

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年），康熙帝则又“赐衍圣公长子孔传铎二品冠服”。

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年），康熙帝则“诏衍圣公孔毓圻第五子孔传钰入监读书”。

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年），康熙帝还“钦颁中和乐器一副”。

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年），康熙帝更“赐衍圣公视正一品大臣，荫一子五品官”。

雍正帝胤禛即位后，不仅推行了尊孔崇儒的政策，较之顺治、康熙二帝更力。而且在孔府的“优渥”方面，事例更多。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特“册封孔子以上五代，皆为王爵，建立崇圣祠，添设礼生二十名。”衍圣公孔毓圻赴京“谢恩”。但“归第卧病”，雍正帝又专“遣御医诊视，并赐参饵。”后孔毓圻“及卒”，则又“遣内大臣奠茶酒。命大学士会同礼臣优议卹典。”还“诏三品以上汉官会吊。特命皇三子及庄亲王率内大臣四员、侍卫二十员至第，再奠茶酒。”后更“仍遣行人司司正护送，驰全驿，旋里。”对孔毓圻则钦“赐谥恭愍”。雍正帝并“御制碑文一道。复命於葬日，再加祭二次。”雍正帝对孔毓圻之死的这种种极不平常的殊荣和恩宠，可谓大大超过顺康两代。

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雍正帝“敕孔传铎承袭衍圣公”。当年，他还亲自“诣学释奠”，并照惯例“先期行取衍圣公及博士族人入京陪祀”是年，曲阜文庙失火遭灾，遣工部侍郎马腊会同山东巡抚陈世倌、布政司博尔多相度重修。凡用帑银一十五万七千六百两有奇。在文庙修复竣工后，雍正帝又御制重修孔子庙碑。

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年），雍正帝又“诏郡县文庙丁祭用太牢”祭孔。

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雍正帝则“颁文庙御书《生民未有》匾额”。并“赐衍圣公御书《钦承圣绪》匾额”。

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雍正皇帝不仅“颁给先圣手执镇圭”，而且同年又“赐衍圣公世祖御制人臣傲心录、圣祖御制文集各书、御制周易本义各书，共二十七种”之多。

雍正八年（一七三〇），雍正帝在命人大修孔庙的同时，特别还为孔庙增设执事官四十员，“每逢圣庙祭祀之时，虔肃冠裳，骏奔趋事”，是年，“重修文庙工竣，遣皇五子致祭阙里。”衍圣公孔传铎入京谢恩。

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年），雍正帝在“诏修孔林的同时，又“诏修衍圣公京城赐第”。还“准衍圣公孔传铎奏，敕孔广柔承袭衍圣公”。

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年），衍圣公“以林工告竣入京谢恩”雍正帝赐御铭松花砚等，并赐宴於礼部。同年，又“颁文庙大成殿、大成门御书匾联及法琅供器等。

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原袭衍圣公孔传铎卒，雍正帝又“诏赐祭葬”。

乾隆时期，乾隆帝在奉行尊孔崇儒政策方面，不仅大大超过前代，而且在对孔府的孔氏贵族地主的“优渥”和赏赐方面，亦更隆更丰。

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乾隆帝“御书《与天地参》匾联，颁於阙里文庙”。

并“诣学释奠”，先期“遣官召取衍圣公孔广燾率博士族人等，赴京陪祀。”次日，“衍圣公入谢”，乾隆帝则“赐宴於内廷，赐御制乐善堂文集一部、貂墨等件，赏赉优叙有差。”^⑩

乾隆六年（一七四一），乾隆帝又颁给阙里文庙铜、盥等器。

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乾隆帝又“颁给钦定阙里文庙四季乐章”。“赐衍圣公孔广燾祭葬”，并“刺孔昭焕承袭衍圣公”爵位。

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乾隆帝又“颁给阙里文庙爵七隻”。

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乾隆帝“幸鲁。赐御制诗章，亲释奠礼成，诣孔林酌酒。御书门榜联额，悬大成殿、诗礼堂及各门。”又“留曲柄黄盖於文庙。赐十三氏子孙宴，赐衍圣公御制诗章、御制乐善堂全集一部、御制日知荟说一部、御选唐宋文醇一部、十三经一部、廿二史一部、貂裘等件。赏赉圣贤后裔及十三氏子孙。有职者，各加一级。增赏进士、举人、贡监银两有差。”

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年），乾隆帝又“颁给衍圣公清、汉篆文一品三台银印”。

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年），乾隆帝则又“赐衍圣公御书孔子庙碑文诗赞墨宝”。

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乾隆帝“圣驾南巡。衍圣公孔昭焕恭迎圣驾。赐御制诗章。诰授衍圣公孔昭焕光禄大夫。”

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年），乾隆皇帝则又“赐衍圣公《三希堂法帖》一部”。

乾隆二十一（一七五六年），乾隆帝又“幸鲁。衍圣公孔昭焕恭接圣驾。赐御制诗章。释奠礼成，诣孔林酌酒。赐衍圣公蟒袍、补褂等件。遣官诣启圣墓奠酒。特设孔氏世袭六品官。”

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乾隆皇帝“圣驾南巡回銮，幸阙里。诣庙拈香，行三跪九叩头礼。”又“诣孔林酌酒”，并“赐御制诗章”。

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年，清军“平定准夷回部”，乾隆帝于是“遣官祭告阙里文庙”。并同时又钦“赐衍圣公《墨妙轩法帖》一部”。

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年），乾隆帝又“赐衍圣公《天瓶斋法帖》一部”。

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乾隆皇帝再次“圣驾南巡。衍圣公孔昭焕恭迎圣驾。赐御制诗章。回銮，驾幸阙里。释奠礼成，赐衍圣公大缎八端。”后来，“衍圣公赴京谢恩，赐御制诗初集、二集各一部。”

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年），乾隆皇帝又特别“颁给阙里文庙铸钟二鬲、特磬二面”。

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年），乾隆帝又亲自“诣学释奠”，并“召衍圣公孔昭焕陪祀。赐《敬胜斋法帖》一部。”

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年），乾隆皇帝“赐衍圣公《皇朝礼器图》全部”，又“赐衍圣公孔昭焕长子孔宪培二品顶带”。

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年），乾隆帝再次“幸鲁。释奠礼成，颁周范铜器十事、御制图说册页一匣、御制五临曲阜诗卷一匣。赏赉有加。”同时，又“颁御书《化成悠久》匾额，悬六成殿。”

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年），乾隆帝赐衍圣公孔昭焕《钦定重刻淳化阁法帖》二

部。赐孔昭焕的长子孔宪培《钦定重刻淳化阁法帖》一部。

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乾隆皇帝赐衍圣公《御制诗三集》一部、《御制评鉴阐要》一部。

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年），乾隆皇帝又幸鲁，祭告文庙。而后，“衍圣公孔昭焕赴京谢恩，恭遇平定金川凯还献俘，行郊劳礼。”于是，乾隆帝又特命衍圣公紫光阁陪宴。仍敕礼部赐宴。

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乾隆帝则“赐衍圣公《御制拟白居易新乐府》一部”。

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年），乾隆皇帝又“赐衍圣公《御制全韵诗》一部”。

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年），乾隆帝“颁《平定准夷回部战图》一部，又赐《兰亭八柱帖》一部。”

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年），乾隆皇帝南巡回銮。衍圣公率长子孔宪培、次子孔宪增，恭迎圣驾。乾隆帝亲自召见，赏大缎、宫绉。

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衍圣公孔昭焕缮疏乞休”，乾隆帝“刺孔宪培承袭衍圣公”。

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乾隆皇帝再次幸鲁。衍圣公孔宪培恭迎圣驾“蒙恩召见”。并且特恩以衍圣公孔宪培在制，“赐御制诗章”。在乾隆帝“释奠先圣礼成”后，又赏衍圣公孔宪培等以大缎等。

应当指出，明清两代，不仅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对孔府进行种种“优渥”和赏赐。另一方面，孔氏贵族地主也定期向皇帝和皇室进贡，遇有喜庆寿日，更要亲自上京朝贺或谢恩。封建帝王来曲阜祭孔，则要迎迓圣驾。

孔氏贵族地主每年向皇帝和皇室进贡若干次。以清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孔府《进贡册》记载的典型材料为例，该年二月初十、五月初六日进贡两次。现以二月一次贡品为例，计有：“白玉镶嵌如意一柄，白玉炉一件，白玉驼一件，古玉果洗一件，古玉文玩一件，古玉文玩五件，古玉灵芝仙洗双件，古玉彝炉一件，古玉蟠桃香盒一件，周青绿象鬲鼎一件，周青绿花觚一件，周青绿越尊一件，汉青绿方壶一件，哥窑双管瓶一件，霁红一统尊一件，定窑宝莲洗双件，嘉窑花囊一件，宋欧磁查斗一件，赵松雪秋江待渡图一轴，倪瓒松石图一轴，李从训平安戩谷图一轴，赵彦麟扫径迎贤图，唐寅山村夜色图一轴，击壤图一卷，陈道复牧丹图一卷，赵昌山茶竹鸟一卷，仇英山水一卷。”“猪九十口，羊九十牵，鹅九十只，鸭九十只，挂面三箱，耿饼三箱，林檎三箱、荸荠三箱，小菜三箱，野菜五味，点心五种。”^①。这样繁多珍奇的贡品，需要耗费成百上千的银两。至于皇帝和皇室喜庆贺寿，则贡物和礼品更丰更盛。

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慈禧太后过六十岁生日，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貽携妻随母上京贺寿。十月初四，孔令貽母彭氏和妻陶氏各向慈禧太后进贡早膳一席。两桌膳用银多达二百四十两。^②这次进京贺寿累计用银二千七百三十四两。^③可购小麦四十六万斤，可供一千二百人食用。

为迎接皇帝“巡幸”孔府的花费更加浩繁。

一七七一年（清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乾隆帝与其母来曲阜朝圣，为取悦皇帝，一

路修建亭台舞榭，所经“御路”派佃户无偿劳役修筑，勒令“黄童白叟欢迎道左”。为迎“圣驾”单是准备戏一班，添办行头，就花银九百二十两^⑭乾隆帝来曲后，衍圣公孔昭焕，献白银一千两，请皇上“进御膳二次”^⑮。招待“随驾大人”的席面，仅乾菜果品这项开销，就费白银二百两^⑯。这一切真是惊人的奢侈了。

至于广大佃户人，不仅受加租、劳役之苦，而且种种摊派，名目繁多。乾隆帝来之前孔府以“接驾预备庆祝事宜”为由，一次摊派“搭采”所用：“黄布五十大丈，蓝布五十大丈，红布三十大丈，白布二十大丈，席一千领，箔一百领，竹竿四百根。”^⑰事隔两月，乾隆帝早已走了，孔府却又以“大差需用布匹”作幌子，向下勒索：“红布二千九百尺，黄布一万二千尺，绿布一千五百八十尺，深鱼白布一千三百尺，共布一万七千七百八十尺”。^⑱

简短的结论：

一、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⑲明清两代的封建统治者，他们在残酷镇压和绞杀农民起义及人民反抗斗争的同时，更是狂热地、频繁地到曲阜祭孔朝圣，并对孔氏贵族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大加“优渥”。这是明清两代封建统治者积极奉行尊崇孔儒的政策的具体表现，这种种“优渥”和恩赏，具有强烈的封建政治的色彩和特点，它是直接用于加强明清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政治思想统治这一目的的，更是孔氏贵族地主积极充当其奴才和工具的反动政治作用的独特表现。

二、纵观明清两代对孔府的“优渥”事例可知，明代最高封建统治者，自朱元璋始，除给予孔氏贵族地主政治上种种殊荣和“优渥”外，更多的是在经济上给孔府以赏赐。到了清代，与明代相比较，孔府的政治殊荣地位更形拔高，康熙、乾隆二帝的多次南巡祭孔及恩赏，使孔氏贵族地主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和声势，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但在土地和户人的钦赐方面，却仅仅维持了明代的规模，而鲜有增添。故清代与前明较之，除经济色彩外，其政治色彩更浓烈。

三、明清两代，孔氏贵族地主进贡和迎接皇帝，直接体现出这个大贵族地主与最高封建统治者特殊的政治关系，也正是仗此地位和声威，孔府才肆无忌惮对佃户人巧取豪夺的。然而，孔府岁岁的贡纳和迎接皇帝“巡幸”孔庙圣地的巨额支出，却又很快地转化为广大佃户人的许多新的劳役和重负。在他们身上，除了要负担孔府各种租税和劳役外，还要承受由此转嫁来的种种摊派和徭役。还应指出，这种额外盘剥，也是最高封建统治者直接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无限额的重负，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赋税。而这一切又恰是导致广大佃户人贫困破产和社会生产停滞的直接根源。

注：

①见《明史》卷284，《列传》第172，

《儒林》3，《孔希学传》。

②③④⑤见《孔府档案》第0079号之3。

⑥⑦⑧⑨⑩见《孔府档案》未编号，《优复恩例四件》

⑪见《孔府档案》未编号，消费（一）。

⑫⑬见《孔府档案》第5476号。

⑭⑯见《孔府档案》第5127号之39。

⑮见《孔府档案》未编号，信件（二）。

⑰见《孔府档案》第5145号之8。

⑱见《孔府档案》第5136号之25。

⑲见《列宁全集》第21卷208页。